

儒家文化、风险偏好与农户土地转入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胡斌红

摘要: 传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农户土地转入的影响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基于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考察儒家文化对农户土地转入影响的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对农户土地转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特别是对于年龄较大、收入水平较低和教育水平较低农户的影响作用更强。降低农户风险偏好是儒家文化影响农户土地转入的重要渠道。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在儒家文化影响农户土地转入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研究拓展了对非正式制度在土地流转领域作用的认识,基于此,应赋予儒家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加大农业保险推广力度,促进农户转入土地。

关键词: 儒家文化; 土地转入; 风险偏好; 数字普惠金融; 农业保险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5.05.005

一、引言

促进土地流转对于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加快土地流转进度,中国持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政策,但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土地流转进度仍然缓慢。《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2023年)》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中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5.91亿亩,占全国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37%左右,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土地流转仍然处于较低水平^①。土地流转是土地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目前制约中国土地流转进度的主要因素是需求不足,其中,农户不愿转入土地是造成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也是基础性原因^②。

如何促进农户转入土地?已有文献主要从正式制度切入,研究发现土地确权、地权稳定性、农业保险、社会保障及农地流转市场化水平等因素均会影响农户土地转入行为。产权明晰是交易的前提条件,农地确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农地流转过程中的矛盾纠纷,提高农户转入土地的积极性^③。土地承包合同是证明农户拥有土地使用权利的重要法律文书,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可以保障农地流转契约的顺利执行,激励农户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农户转入土地^④。农业保险可以为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提供充足的风险保障,促进农户通过转入土地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农业收入^⑤。利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农业“三项补贴”改革显著促进了农户转入土地,尤其是向经营者倾斜的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及路径研究”(23BJY257)。

作者简介: 胡斌红,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太原 030006; hubinhong@126.com)。感谢山西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上官丽媛,其在本研究的数据处理与分析中做了大量工作。

① 陈飞、翟伟娟:《农户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诱因及其福利效应研究》,《经济研究》2015年第10期。

② 李江一、秦范:《如何破解农地流转的需求困境?——以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例》,《管理世界》2022年第2期。

③ 胡新艳、许金海、罗必良:《新一轮农地确权促进连片规模经营——来自地块离散流转与连片流转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24年第5期。

④ 朱诗娥、杨汝岱、王璐等:《中国农村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模式变迁》,《管理世界》2024年第1期。

⑤ 柴智慧:《参与农作物保险是否促进农户农地转入?——基于内蒙古的微观实证》,《保险研究》2021年第12期。

农业补贴政策取得了最佳的促进效果^①。同样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大豆生产者补贴会促进农户通过转入土地的方式扩大大豆种植面积^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以改善农户健康状况、增加劳动供给并加大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和生产投资,从而促进农户转入土地^③。基于全国14个省份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完善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可以提高农户管理效率,减少农业劳动力投入,从而提升农地经营效益,促进农户转入土地^④。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可以加快农地的集中化趋势,促进农户的土地转入行为^⑤。以上研究为理解农户如何作出土地转入决策提供了有益启示。当前,虽然国家土地政策持续改革、地权稳定性不断强化、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土地市场和交易市场逐步完善,但农户转入土地积极性不高的现象仍未得到明显扭转^⑥。

要深刻理解中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不能仅局限于正式制度视角,更应重视在长达数千年历史中缓慢形成且影响深远的非正式制度^⑦,以传统文化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会对个体的认知、偏好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个体决策。在所有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儒家思想已深刻地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⑧。然而,从传统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土地转入行为的文献仍然鲜见。基于此,综合运用历史典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等方法,从儒家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视角探究影响农户土地转入行为的文化内因。相较于已有文献,边际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了儒家文化对农户土地转入的影响,深化了对农户转入土地决策中赖以依存的文化土壤及其力量逻辑的理解,为土地转入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维度,丰富了土地流转领域的研究文献。第二,从风险偏好视角揭示了儒家文化作用机制的发挥,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可以调节儒家文化对土地转入的影响效应,为解释儒家文化的影响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全面揭示了儒家文化及其隐形价值规范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从微观层面深化了对儒家文化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除正式制度外,非正式制度也会对个体决策产生重要影响^⑨。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传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⑩。根据烙印理论,个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文化土壤和成长环境影响,并在个体决策中予以体现。这意味着,长期以来的儒家文化熏陶将在农户的价值体系中留存烙印,对农户个体认知和行为塑造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在农户转入土地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可以围绕儒家文化影响农户转入土地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进行相应的理论分析。

① 杨青、彭超、许庆:《农业“三项补贴”改革促进了农户土地流转吗?》,《中国农村经济》2022年第5期。

② 王新刚、司伟、冯晓龙等:《大豆生产者补贴对农户土地投入决策的影响——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23年第1期。

③ 张锦华、刘进、许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土地流转与农地滞留》,《管理世界》2016年第1期。

④ 江帆、宋洪远:《农业生产托管何以影响农户土地转入规模——基于农户分化的视角》,《农业技术经济》2025年第1期。

⑤ Xu M. J., Chen C. L., Ahmed M. A., “Market-oriented Farmland Transfer and Outsourced Machinery Services: 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24, 81, pp. 1214-1226.

⑥ 杨融、张永峰、路瑶:《集体行动、风险分担与土地流转》,《经济与管理》2022年第5期。

⑦ Allen F., Qian J., Qian M.,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 77(1), pp. 57-116.

⑧ 刘铠豪、王雪芳:《儒家文化、家庭社会捐赠与共同富裕》,《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⑨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18.

⑩ 晋洪涛、郭秋实、史清华:《村庄里的“家”与“面子”:农户为何不愿退出宅基地——基于非正式制度嵌入性的一个解释》,《中国农村观察》2022年第4期。

(一) 风险偏好在儒家文化影响农户土地转入中的中介作用

受浓厚的儒家文化影响可能会降低农户的风险偏好。儒家文化推崇“谨言慎行”的中庸思想、“行事稳健”的保守观念以及“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强调“有备无患”的风险防范理念。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主张言语谨慎、行为稳健,《论语·学而》提到“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礼记·经解》亦说“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有“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的表述,都反映出儒家文化规避风险的态度。同时,儒家文化主张集体主义思想,倡导个体在集体中实现自我价值,不鼓励个人特立独行的表现,也促使个体倾向于规避风险^①。另外,儒学“以和为贵”的和谐主义观念也促使个体形成了相对保守的风险态度^②。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倡导谨慎行事的风险规避态度,农户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大则风险偏好可能越低。

风险偏好作为农户应对风险冲击的态度,对农户土地转入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根据风险收益理论,只有当农户认为风险可控,且预期未来进行生产经营所得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农户的土地转入行为才可能发生。然而,农业生产的根本特性使得农户在经营土地过程中将面临较为严重的经济和自然等各类风险^③,其中经济风险主要包括契约风险、市场风险及政策风险。土地转出方可能因非农就业受阻或土地流转价格较低等原因而选择违约,给土地转入方带来契约风险。而农户转入土地后,一旦经营项目选择不当、管理不善或农产品市场价格不稳定,就会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可能还会面临农业补贴政策变动、农产品价格受政府调控、国际贸易政策调整等政策风险。与此同时,干旱、洪涝、大风、霜冻等自然灾害可能给农户带来自然风险。农户转入的土地越多,经营的土地规模越大,则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农户进行经营的潜在收益就会降低,使其不愿转入土地。需要说明的是,儒家文化中的“重农抑商”思想虽然主张重视农业、以农为本,会促使农户过度留恋并依赖土地而形成“恋地”“惜地”偏好。但是,农户转入土地进行经营在本质上是一种承担风险的“商业”行为,“重农抑商”思想更多的是影响农户的土地转出而非转入行为,这一思想恰好说明儒家文化不利于“商业”行为的产生,即不利于农户转入并且经营土地。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儒家文化通过降低农户的风险偏好从而抑制土地转入行为。

(二) 数字普惠金融在儒家文化影响农户风险偏好中的调节作用

传统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居高不下、风控难度大、服务覆盖面有限等问题,无法为包括农户在内的“长尾”用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以数字技术为载体,服务效率高且服务渗透性强,可以有效满足客户便捷化、多元化、个性化的金融需求。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提高农户金融素养,削弱儒家文化对农户风险偏好的负向影响。首先,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高了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的覆盖广度,使农户家庭可以置身于各类数字化金融场景中,有机会接触到各类专业的金融知识,提升农户的金融素养^④。金融素养较高的农户在投资决策、信贷资金获取、财务收支等方面的管理能力较强,可以科学地计算出土地转入的风险及收益,对于是否转入土地能够进行理性地判断与决策^⑤。此外,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的农户还有能力提前进行各种预防性安排,抵

① Ge Y. B., Kong X. R., Dadilabang G., et al., “The Effect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Household Risky Asset Holdings: Using Categorica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23, 28, pp. 839-857.

② 袁丰、于灵慧、赵岩等:《文化差异视角下中国区域间企业投资网络与选择机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地理研究》2023年第7期。

③ 王胜、屈阳、王琳等:《集中连片贫困山区电商扶贫的探索及启示——以重庆秦巴山区、武陵山区国家级贫困区县为例》,《管理世界》2021年第2期。

④ Bhamra H. S., Uppal R., “Does Household Finance Matter? Small Financial Errors with Large Social Cos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09(3), pp. 1116-1154.

⑤ 王义中、林溪、李振华等:《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共同富裕:基于流动性约束视角》,《经济研究》2024年第6期。

御可能发生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增强风险承受能力^①,从而削弱儒家文化这一传统思想对于农户风险偏好的负向影响。其次,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还可以增强农户对于金融服务的使用深度,数字普惠金融依托大数据对农户进行精准画像,打破金融机构地理区位限制,提高农户金融服务可得性,促进农户积极参与金融市场,获得农业生产所需资金。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平台通常还会提供农业种植技术培训、农业经营技能提升、农产品市场价格实时反馈等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便捷的数字化服务使农户更有信心和能力规避或分散在追求高收益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减弱儒家文化对农户风险偏好的负向影响^②。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缓解儒家文化对农户风险偏好的负向影响。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调节儒家文化对农户风险偏好的负向影响。

(三)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在风险偏好影响农户土地转入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的提高可能会调节风险偏好对于农户土地转入的影响。农户转入土地虽然可以扩大经营规模,促进农业机械化生产从而提高经营效率,但同时也伴随着更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农户担心转入土地后不能获得预期收益,进而对土地转入产生顾虑^③。而农业保险的发展可以为农户在土地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提供保障与补偿功能,提高农户预期收益,激励农户扩大生产经营规模^④。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可以转移和分散土地转入者的经营风险,提高他们参与农地转入的意愿和信心。从应对自然风险来看,农业保险可以为无力承担自然灾害的农户提供补偿,增强农户灾后生产恢复能力,使其不会因遭受自然灾害而一夜致贫。从降低市场风险来看,农户转入土地后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极大的市场不确定性,而农业保险尤其是产量保险、收入保险、价格保险和指数保险等新型保险产品的发展和普及,可以极大地降低农户面临的市场风险,稳定市场预期^⑤。另外,随着农业保险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保险公司可以更为精准地掌握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以及保险标的物的种植面积、产品种类、市场价格、损失程度等数据,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农业保险赔付效率,降低农业保险投保价格,提升农业保险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得性^⑥,促使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增强他们对转入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信心,缓解较低风险偏好对于农户土地转入的抑制作用。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可以调节风险偏好对农户土地转入的正向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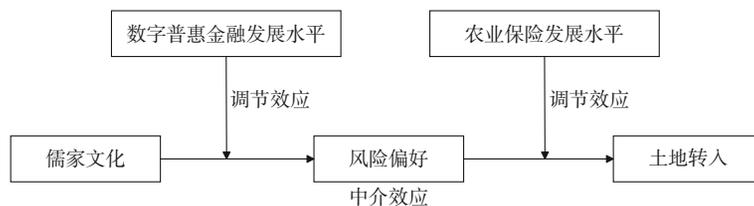


图1 儒家文化影响农户土地转入的理论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朱波、裴珊:《数字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韧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中国软科学》2024年第10期。
 ② 赵丙奇、俞凯丽:《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创业的机制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24年第6期。
 ③ 郑旭媛、林庆林、周凌晨诺:《中国农业“双规模”经营方式创新、绩效及其外溢效应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22年第7期。
 ④ Liu Y. Y., Chen K., Hill R. V., “Delayed Premium Payment, Insurance Adoption, and Household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20, 102(4), pp. 1177-1197.
 ⑤ 金绍荣、任赞杰、慕天媛:《农业保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农业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研究》2022年第1期。
 ⑥ 温涛、陈一明:《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融合发展:实践模式、现实障碍与突破路径》,《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7期。

三、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该数据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追踪调查项目。数据中包含“土地、耐用品与农业机械”这一模块,调查了家庭土地转入与转出相关情况,为实证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基础。在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及异常的农户样本后,最终获得4667个农户样本。

儒家文化数据是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的记载,手工整理出每位中榜进士的籍贯地,并将其与中国当前的地级市行政区划进行匹配,得到各地级市的儒家文化强度数据。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土地转入,依据CFPS问卷中“您家是否租用他人土地”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来衡量,若农户回答“是”,表明转入了土地,该变量赋值为1;若回答“否”则赋值为0。

2. 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是地区儒家文化,延续既有文献的做法^①,使用各地级市明清进士数量来测量,一个地区的明清进士数量越多,表明该地区的儒家文化越浓厚。从整理出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不同地区的儒家文化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儒家文化较浓厚的六个省份分别是浙江省、江苏省、江西省、山东省、福建省和河南省,这与Du整理的儒学中心所在地(鲁、川、闽、豫、浙和赣)基本一致^②。

3.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户主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以及农户所在地区经济特征等。

(三)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农户土地转入变量的均值为0.055,表明在全部样本中,土地转入发生率偏低。儒家文化的均值为7.238,标准差为1.289,说明不同地区儒家文化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他控制变量分布均在合理范围内。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别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土地转入	1=是;0=否	0.055	0.227	0	1
核心解释变量	儒家文化	将地区明清进士数进行对数化处理	7.238	1.289	0	8.762
控制变量	户主性别	1=男性;0=女性	0.563	0.496	0	1
	户主年龄	农户实际年龄除以100	0.509	0.141	0.18	0.80
	户主受教育程度	根据户主受教育年限赋值,如从未上过学赋值为0,博士赋值为19	7.845	4.588	0	19
	户主健康状况	根据户主健康程度,从不健康到健康分别赋值为1-5	2.977	1.207	1	5
	家庭收入	将家庭总收入进行对数化处理	10.899	1.256	0	15.068
	家庭老年人口比例	家庭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	0.189	0.313	0	1
	家庭金融素养	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赋值为1,否则为0	0.779	0.415	0	1
	家庭土地征收情况	过去两年土地被征收赋值为1,否则为0	0.041	0.198	0	1
家庭成员个体经营情况	有成员从事个体经营赋值为1,否则为0	0.089	0.285	0	1	

① 才国伟、谢佳松:《儒家文化传统与当代企业创新》,《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② Du X., “Does Confucianism Reduce Board Gender Diversity?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6, 136(2), pp. 399-436.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为了探究儒家文化对农户土地转入的影响,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y_i = \alpha_0 + \alpha_1 Conf_i + \alpha_2 X_i + \epsilon \tag{1}$$

其中, y_i 为虚拟变量,表示农户*i*的土地转入状况; $Conf_i$ 代表农户所在地区的儒家文化强度; X_i 表示可能影响农户土地转入的其他因素; α_1 为待估参数, ϵ 为随机扰动项。

由于土地转入是二值变量,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儒家文化对农户土地转入的影响效应。表2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是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仅控制省份固定效应情形下的估计结果,列(2)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了一系列户主特征控制变量,列(3)进一步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可以发现,在控制省份固定效应且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形下,儒家文化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抑制了农户的土地转入。列(4)是加入所有控制变量但未控制省份固定效应情形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对农户土地转入的影响同样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以上结果表明,儒家文化会显著抑制农户转入土地。

表2 基准回归检验结果

	土地转入			
	(1)	(2)	(3)	(4)
儒家文化	-0.739*** (-3.52)	-0.579*** (-2.71)	-0.596*** (-2.76)	-0.154*** (-4.06)
户主性别		0.464*** (3.57)	0.489*** (3.72)	0.507*** (3.93)
户主年龄		14.202*** (3.87)	8.750** (2.12)	8.635** (2.13)
户主年龄平方		-15.640*** (-4.35)	-8.916** (-2.09)	-8.760** (-2.10)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60*** (-4.17)	-0.087*** (-5.90)	-0.089*** (-6.16)
户主健康程度		0.025 (0.50)	0.003 (0.07)	0.004 (0.08)
家庭收入情况			0.487*** (6.09)	0.419*** (5.52)
家庭老年人口比例			-0.589* (-1.66)	-0.677* (-1.69)
家庭金融素养			0.100 (0.65)	0.060 (0.40)
家庭土地征收情况			-0.071 (-0.22)	-0.056 (-0.18)
家庭成员个体经营情况			-0.241 (-1.08)	-0.219 (-1.00)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常数项	2.393* (1.67)	-1.647 (-0.90)	-5.673*** (-2.74)	-7.777*** (-5.89)
Pseudo R ²	0.027	0.051	0.075	0.051
样本量	4667	4603	4588	4588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以下各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

为缓解遗漏变量等问题的干扰,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借鉴相关文献的做法^①,使用各地区贞节牌坊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贞节牌坊是古代表彰妇女“从一而终”的客观物质形式与载体,是儒家伦理的重要产物,且一地的贞节牌坊数量与农户是否转入土地关联不大。所以,地区贞节牌坊数量是较为合适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列(1)报告了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贞节牌坊数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统计检验,表明一地的贞节牌坊数量越多,当地的儒家文化越浓厚,这与预期相符。第一阶段回归中F统计值大于10,证明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列(2)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儒家文化对农户土地转入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儒家文化显著抑制了农户转入土地,与上述理论推导一致。

表3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1) 第一阶段	(2) 第二阶段
儒家文化		-0.068*** (-5.27)
贞节牌坊数量	0.035*** (10.51)	
孔庙数量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8.193*** (22.56)	0.313** (2.48)
Pseudo R ²	0.070	—
样本量	3886	3886
第一阶段F统计值	84.596	

2. 更换被解释变量测量方法

基准回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用交付租金条件下农户的土地转入情况进行测量,此处进一步放宽约束条件,将农户在转入土地时交付和未交付租金的情况均定义为土地转入,估计结果如表4列(1)所示。可以发现,儒家文化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表明儒家文化对土地转入行为产生了负向影响,进一步支持了研究假说。

3. 更换解释变量测量方法

为了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采用地区孔庙数量和儒家书院数量对儒家文化进行测量,检验儒家文化对农户土地转入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4列(2)和列(3)所示,可以看出,孔庙数量和儒家书院数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81和-0.129,且分别在1%和5%水平下显著,与前面的实证结论保持一致。

4. 剔除中心城市检验

由于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等中心城市有较大的经济和政策特殊性,可能会使估计结果产生偏差。为进一步检验儒家文化和农户土地转入关系的稳健性,剔除样本数据中属于中心城市的农户样本后重新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4列(4)所示,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对农户土地转入依然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支持上文的研究结论。

^① 刘铠豪、王雪芳:《儒家文化、家庭社会捐赠与共同富裕》,《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5. 更换估计方法

自助法(Bootstrap)是对样本进行反复抽样从而获得参数的置信区间,以此判断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本文采用该方法(重复取样次数设置为500)重新估计儒家文化对农地转入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4列(5)所示。可以发现,儒家文化影响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表明儒家文化对农地转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土地转入				
	(1) 更换被解释变量检验	(2) 更换解释变量 (孔庙数量)	(3) 更换解释变量 (儒家书院数量)	(4) 剔除中心城市检验	(5) 自助法检验
儒家文化	-0.543*** (-3.06)	-0.381*** (-2.62)	-0.129** (-2.13)	-0.758*** (-3.03)	-0.596** (-2.0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3.696** (-2.18)	-10.084*** (-7.49)	-5.501*** (-7.24)	-4.227* (-1.94)	-5.639** (-2.55)
Pseudo R ²	0.063	0.051	0.064	0.074	0.069
样本量	4588	4616	4552	3878	4588

(三)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儒家文化对不同特征农户的影响差异,从农户年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三个方面来捕捉可能的异质性效果。

1. 基于农户年龄的异质性检验

根据户主年龄将样本划分为年龄较小农户(户主年龄小于50周岁)和年龄较大农户(户主年龄大于等于50周岁)两组,回归结果如表5列(1)和列(2)所示。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对年龄较小农户的影响系数不显著,对年龄较大农户的影响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儒家文化对农地转入的负向影响在年龄较大家庭中表现更为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相比于出生年代较晚的青年人,中老年人受儒家文化影响往往更深,导致中老年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更大^①。另一方面,与年龄较大的农户相比,年龄较小的农户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以及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方面都有更强的优势,减弱了儒家文化对农户土地转入的影响效果。

2. 基于农户家庭收入的异质性检验

按照本省份农户收入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低收入农户和高收入农户两组并分别进行检验。从表5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低收入农户与高收入农户的影响系数均在5%水平下显著为负,但低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系数更大,表明儒家文化对低收入农户土地转入的抑制作用更明显。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高收入农户在金融素养及受教育程度方面更具优势,可以理性地作出土地转入的决策与判断^②,减小了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与低收入农户相比,高收入农户有着更强的风险偏好^③,在儒家文化降低农户风险偏好这一过程中,高收入农户受到的影响较弱,因而儒家文化对高收入农户土地转入的影响效应更弱。

① 潘文东、李万利、汤旭东:《儒家文化与家庭资产配置——基于风险偏好和生育意愿双重视角的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年第12期。

② 徐莹、王娟:《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差距:加剧还是缓解》,《农业技术经济》2024年第3期。

③ 魏佳翔、高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如何影响小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2期。

3. 基于农户受教育水平的异质性检验

按照户主学历水平,将样本划分为低教育水平(高中或中专及以下)和高教育水平(高中或中专以上)两组样本并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列(5)和列(6)所示。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对低教育水平农户土地转入的影响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对于高教育水平农户的影响系数不显著,表明儒家文化对农户土地转入的负向影响主要存在于低学历农户中。原因在于:第一,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对于土地转入的风险具有更为理性、科学的认识,可以削弱儒家文化作用的发挥。第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在学习和应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能力更强,可以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在调节儒家文化影响风险偏好过程中作用的发挥,降低儒家文化对农户转入土地的负向影响。第三,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对于购买农业保险的重要性以及农业保险产品知识有着更为深刻的了解,对于农业保险的购买意愿较为强烈,更好发挥了农业保险在缓解农户风险偏好影响农地转入行为中的调节作用,因而儒家文化对其土地转入的影响较小^①。

表5 异质性分析估计结果

	土地转入					
	农户年龄异质性检验		农户收入水平异质性检验		农户受教育水平异质性检验	
	(1) 年龄较小	(2) 年龄较大	(3) 低收入水平	(4) 高收入水平	(5) 低教育水平	(6) 高教育水平
儒家文化	0.101 (0.32)	-0.965*** (-2.85)	-0.984** (-2.21)	-0.513** (-2.05)	-0.765*** (-2.99)	-0.186 (-0.39)
常数项	-2.130 (-0.58)	-5.618 (-0.75)	-5.899** (-2.21)	-7.982** (-2.03)	-4.928** (-2.02)	-5.094 (-1.0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 R ²	0.085	0.104	0.061	0.151	0.079	0.083
样本量	1823	1962	3105	1426	3431	973

五、进一步分析

(一) 中介效应检验

对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根据江艇对因果推断中的中介效应分析的建议^②,重点关注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风险偏好的影响。借鉴相关文献的做法^③,对农户风险偏好程度的测量,基于受访者“行为与精神状态”问卷模块来度量,2022年CFPS调查数据询问了受访者关于睡眠、健康、吸烟等一系列风险试验,根据受访人的选择结果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确定权重,以此测量出农户的风险偏好程度,取值越大,表明农户的风险偏好程度越高。从表6列(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解释变量儒家文化对中介变量风险偏好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儒家文化对农户风险偏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地区儒家文化的影响显著降低了农户的风险偏好,从而抑制农户转入土地,假说1得到验证。

(二) 调节效应检验

1. 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效应

进一步地,选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造儒家文化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交互项,并将其纳入基准回归模型中进行检验,表6列(2)汇报了估计结果。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且通

① 方蕊、安毅、胡可为:《“保险+期货”试点保险与传统农业保险——替代还是互补》,《农业技术经济》2021年第11期。

② 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5期。

③ 张世虎、顾海英:《信息渠道变革引致乡村居民多样化高质量就业的逻辑》,《劳动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

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缓解儒家文化对农户风险偏好的负向影响,假说2得到验证。

2. 农业保险的调节效应

为考察农业保险在农户风险偏好影响土地转入行为中的调节效应,引入风险偏好与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的交乘项,将其纳入基准回归模型中进行检验。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①,采用近三年农业保险保费规模来衡量农业保险发展水平,数值越大表明农业保险发展水平越高,从表6列(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在风险偏好影响农户土地转入过程中发挥了调节作用,假说3得到验证。

表6 儒家文化与土地转入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风险偏好	数字普惠金融 调节效应检验	农业保险 调节效应检验
	(1)	(2)	(3)
儒家文化	-0.014*** (-6.17)	-0.747*** (-3.06)	-
数字普惠金融与儒家文化的交互项		0.135*** (3.03)	
农业保险与风险偏好的交互项			0.096** (2.4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041 (0.85)	8.551** (2.52)	-10.363*** (-7.77)
Pseudo R ²	0.181	0.179	0.055
样本量	4603	4588	4566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将儒家文化对农户土地转入的影响作为分析对象,纳入农户风险偏好因素,以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儒家文化对农户土地转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及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儒家文化对年龄较大、收入水平较低和受教育水平较低农户土地转入的抑制作用更强。从作用机制看,儒家文化主要通过降低农户风险偏好进而抑制其土地转入行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儒家文化影响农户风险偏好中发挥调节作用,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在风险偏好影响农户土地转入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关注儒家文化对农户土地转入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②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深远,我们不应该全部舍弃,也不能一味继承,对儒家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和完善,赋予其新的时代内

① 马九杰、杨晨、崔恒瑜等:《农业保险的环境效应及影响机制——从中国化肥面源污染视角的考察》,《保险研究》2021年第9期。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19页。

涵,引导农户客观、理性地看待土地转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

第二,适度提高农户风险偏好水平。首先,提升农户金融素养。推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高等院校等多元主体在农村地区广泛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使农户可以更多地了解金融政策和知识,消除农户对于金融服务“不愿用”和“不敢用”的认知及行为偏差,适度强化农户风险偏好^①。其次,树立示范典型。综合利用线上线下渠道,对积极承担风险、参与农地流转以提升经营规模的农户作为典型案例加以宣传,发挥其模范带头作用,调动起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最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政府应构建涵盖价格稳定的农资供应机制、先进适用的技术培训与指导体系、线上线下多元的农产品销售渠道等多环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降低农户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提高农户对于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促进农户转入土地。

第三,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首先,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地区5G、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确保更多农户能够享受到数字金融服务。其次,鼓励金融机构向“长尾”人群提供差异化的数字产品与服务。金融机构在设计数字金融产品时要立足农村实际,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农业生产规律和农户资金需求特征,以此为依据设计差异化的产品额度、期限与还款方式。同时,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简化业务流程,降低操作门槛,提高农户参与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性。最后,重点提升弱势群体数字技能。针对高龄农户,可通过手把手的方式开展数字金融实操培训,提升其数字技能。针对收入水平较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户,可通过通俗易懂的短视频、图文并茂的宣传手册等形式开展数字金融教育,在学习过程中为农户提供小额数字消费券作为激励手段,提高农户培训积极性,提升弱势群体数字技能。

第四,加大农业保险推广力度。首先,政府应依托村委会、专业合作社及驻村干部等组织和群体,做好农业保险的宣传与推广工作,重点通过案例讲解等形式,让大家充分意识到农业保险对于分担农业经营风险的重要作用。保险公司可组织开展农业保险理赔现场会,让农户真实感受到投保带来的好处,激发农户投保积极性。其次,保险公司应将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积极应用到产品设计和开发中,从传统的仅保自然风险向保市场和自然双重风险的方向转型,加快探索价格保险、产量保险、天气指数保险等新型保险产品,充分满足广大农户多元化、差异化的保险需求。最后,政府应加大农业保险补贴力度,制定差异化的保费补贴标准,减轻农户保费负担,提高农户投保积极性,为农户进行土地经营提供保障,促进农户转入土地。

Confucian Culture, Risk Preferences, and Farmers' Land Transfer-i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Hu Bin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 P.R.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land transfer is vital for China to realiz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because it can increase income of farmers and guarante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primarily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mal institution and finds out the impact of factors such as land rights confirmation, tenure security,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marketization level of land transfer on the land transfer-in of farmers. Despite the persistent reform of the national land

^① 徐书林、陈克兢:《中国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决策的同群效应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2024年第10期。

policy,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the land and transaction market, the constant reinforcement of tenure stability, and the steady increase of social security, farmers' low enthusiasm for land transfer-in has not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requiring deep considera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order to profoundly understand divers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in China, it is essential to look beyond the formal institution and consider th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 - informal institution represented by traditional culture. Nevertheless, there is a lack of attention to this influence.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22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leverages methods like historical classic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s, 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internal factors affecting farmers' land transfer-in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 culture (an informal institution). As revealed by the research, Confucian cultu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influences land transfer-in behavior of farmers. Particularly, the impact is stronger for older farmers with a lower income level and a lower educational level. Reduction of farmers' risk preference is a crucial channel for Confucian culture to influence farmers' land transfer-in. Beyond that, the developmental levels of regional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agricultural insurance respectively exert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where Confucian culture affects farmers' risk preference and risk preference influences farmers' land transfer-in. This paper has thre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Firstly, it explores the impact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farmers' land transfer-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deepens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cultural soil and its power logic relied upon in farmers' land transfer-in decisions, and provides a new explanation dimension for the land transfer-in phenomenon.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preference,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Confucian culture is demonstrated, and the role of regional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agricultural insurance development level in moderating the effect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land transfer-in is found, lay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illustrating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Confucian culture. Thirdly, the theoretical cognition o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onfucian culture is deepened. This paper holistically uncovers the influential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Confucian culture and its implicit value norms on farmers' land transfer-in behavior, and reinforces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onfucian culture at a micro level. While expanding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role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 the land transfer field, this paper suggests endowing Confucian culture with new connotations of the times, developing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moderately improving the risk preference level of farmers, strengthening the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nd promoting farmers' land transfer-in.

Keywords: Confucian culture; Land transfer-in; Risk preference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gricultural insurance

[责任编辑:郝云飞]